

照护6个月至1岁婴幼儿的“乳儿班”日益走俏,成为上班族父母的新选择

“乳儿班”来了,双职工家庭的育儿压力减轻了吗?

本报记者 刘友婷

夜风寒挟着冬日的凉意钻进衣领,刚走出办公楼的倪赛男将外套收紧,不由得加快脚步,直奔地铁站。她看了看时间,心里盘算着:“到家得晚上九点多了,孩子估计已经睡下了。”

38岁的倪赛男是深圳电气设计行业的一名技术人员。育儿后再就业,她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托育园的支持,增加了我做好工作的底气,让我在职业发展和照顾家庭方面找到了平衡。”

倪赛男的经历是许多双职工家庭的缩影。随着经济发展和家庭结构的转变,不少家庭面临育儿与工作的双重压力,特别是3岁以下幼儿的托育难题,成为当下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工人日报》记者了解到,“乳儿班”等新兴托育服务正为双职工家庭带来新的选择。

回归家庭,还是发展事业?

备孕期间,倪赛男因失业不得不暂时回归家庭。孩子出生后,面对经济压力,她想重返职场。

“孩子调皮好动,家里老人体力跟不上;孩子感冒发烧,需要频繁请假……”回忆起刚返岗的日子,倪赛男直言“苦不堪言”。一边要重新适应工作节奏,一边是生活中的种种琐事,常常令她力不从心。

对于双职工家庭而言,照护婴幼儿并非易事。“回归家庭,还是发展事业”,成了许多职场女性不得不面对的一道关卡。在同样面临两难选择的陈美琳(化名)看来,辞去工作不仅意味着家庭失去一份经济来源,更意味着女性主动将自己推向了被社会边缘化的境地。

阅读提示

眼下,不少家庭面临育儿与工作的双重压力。“乳儿班”等新兴托育服务不仅能让孩子接受专业照护和早期教育,还能让职工安心工作,提升工作效率、高质量陪伴孩子,减少家庭矛盾,可谓多方受益。

据了解,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家庭小型化趋势愈加明显,代际之间照料能力减弱,越来越多的家庭需要高质量的托育服务。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我国现有近3000万名3岁以下婴幼儿,超过三成的婴幼儿家庭有人托需求。

焦虑之际,陈美琳惊喜地发现,单位旁边新开了一家托育园。她立刻带着4个月大的宝宝上门咨询。

然而,家中只有陈美琳的母亲支持她。“母亲不希望我被‘困’在家里。”当时身边的人大多不理解陈美琳的做法,甚至指责她“心狠”,让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离开母亲。

经过实地考察,陈美琳被托育园专业的设施和服务打动,她把家搬到了托育园附近。倪赛男也将儿子送到距离居住小区步行15分钟的托育机构。“托育能让我安心上班,也能让孩子得到专业照护。”

破解育儿困境,提升工作效率

记者了解到,托育服务根据婴幼儿不同年龄段的需求,设置了6个月~1岁的“乳儿班”、1~2岁的托小班、2~3岁的托大班,提供精细化照护。深圳市托育服务协会秘书长丁灵芝告诉记者,“乳儿班”的用户中,90%为双职工家庭。

丁灵芝说,双职工家庭的育儿困境,主要集中在祖辈难以参与照护或教育观念差异引发矛盾、育儿嫂价格高昂且供不应求,以及父母难以平衡事业与家庭等方面。

李颖文在深圳一家外贸企业做产品经理

师。因夫妻俩工作繁忙,育儿任务长期依赖婆婆。

然而,婆婆因身体原因常需住院治疗,夫妻二人不得不轮流请假照顾孩子。为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压力,李颖文决定将女儿送到托育机构。

托育服务为李颖文一家提供了稳定的育儿支持,也缓解了家庭矛盾。“孩子入托后,我不需为照护问题发愁,婆婆也从繁重的育儿任务中解放了出来,家里的观念分歧少了,工作效率也提高了。”

记者了解到,许多职工选择托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孩子能在专业的托育环境中获得更系统的成长。

互联网行业程序员黄希看重的正是托班的专业性。这位90后新手妈妈在送孩子去“乳儿班”前,曾饱受家庭育儿带来的困扰,“家里说方言,奶奶不太爱说话,结果孩子语言发育迟缓。工作忙,没时间纠正,我常因此感到内疚。”

2022年底,黄希将女儿送入托育园后,发现孩子在与同龄人的互动中,语言能力和独立性显著提高。

“作为程序员,我面临着激烈的行业竞争。过去,每到下班就要赶回家照顾孩子,忙家务。现在,我和丈夫也能更专注于工作,专心冲刺业绩。”黄希说。

此外,李颖文还提到托班可以帮助孩子更自然地过渡到幼儿园生活,减少了心理落差。“我们家说粤语,孩子刚开始听不懂普通话。幸好托班有懂粤语的生活老师,帮助她度过了适应期。现在,她已经能和小朋友用

普通话交流了。”李颖文说。

规范托育服务行业发展,减轻育儿负担

尽管托育服务在缓解职工养育压力方面成效显著,但行业仍面临有效供给不足、价格偏高及监管不完善等问题。

《国务院关于推进托育服务工作的报告》显示,2023年我国民办托育机构占比高达89.5%,平均托育服务收费价格(不包括餐费)为1978元/人/月,一线城市在5500元/人/月以上,许多有送托需求的家庭望而却步。多地调查显示,超过三成的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有送托需求,但实际入托率仅为7.86%。

托育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伴随着成本的考验。以黄希为例,每月仅育儿照护方面的开支就过万元。

如何规范托育服务行业发展,更好地托起“小家”的幸福?2024年10月,国家发改委和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支持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通知》,明确普惠托育服务机构的范围,规范收费机制,减轻家庭育儿负担。

丁灵芝认为,推动托育行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多方协作精准施策。一方面,要通过政策扶持和财政投入,缓解场地紧缺、设施不足等瓶颈问题,降低托育行业的建设成本;通过税收优惠及奖补政策,支持企事业单位与专业托育机构合作办托,提升服务的普惠性。

另一方面,应强化专业人才培养,与高校合作建立针对0~3岁婴幼儿的护理教育体系,提高行业专业化水平;将托育行业从业者纳入特殊紧缺人才范围,提高待遇。此外,应加强制定化桌椅、卫生设施等设施设备的投入,更好地满足群众的托育需求。

江苏:生育一孩可享百分之五十社保补贴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本报讯(记者黄洪涛)近日,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江苏省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措施》),围绕生育服务、托育体系等方面推出15条务实举措,着力减轻职工生育、养育、教育等方面负担。

“《措施》努力为每个家庭生育减负、生活提质。”江苏省卫健委主任谭颖介绍,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减轻生育医疗费用负担,今年3月1日起,对女性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生育的,一次性加发3个月的失业保险金。

谭颖表示,2024年7月起,江苏将13个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和分娩镇痛等项目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今年,将进一步优化完善医保和生育保险相关政策,有效减轻家庭生育负担,推进生育津贴“免申即享”。

同时,优化生育假期成本共担机制。谭颖说,将企业支付女职工产假期间的社会保险费用补贴标准,在现行对生育二孩、三孩补贴基础上,扩大到对生育一孩的给予50%的补贴。严格落实产假、延长产假、男方护理假、哺乳假、育儿假等制度及相关待遇。

记者了解到,针对职工“带娃难”问题,江苏将大力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推动社区嵌入式托育点建设,支持机关、企事业单位为职工提供福利性托育服务。

教育、住房、就业方面,江苏将优化城乡学前教育资源配置,支持幼儿园提供寒暑假托管服务;进一步健全完善多子女家庭购房支持政策,把符合条件的多子女家庭纳入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性租赁住房等保障范围;为因生育中断就业的女性提供再就业培训公共服务。

截至2024年底,江苏省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213万人,生育保险费用涵盖产前检查、住院分娩等各环节。江苏省医保局副局长朱丽蓉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大研究出台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业态形态人员生育保险相关政策,推进职工生育医疗费用异地直接结算,切实增强群众的医保获得感。

福建推动家政服务员职业化

本报讯(记者李润剑)“从前,家政阿姨带一个桶、一块抹布就上岗了,现在,专业性不断提升,管理也越来越规范。”福建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福建省家政服务有限公司育婴员刘娟说。如今,福建家政服务有望从打零工迈向职业化的发展道路。近日,福建省人社厅等七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加强家政服务业职业化建设的十二条措施》,围绕提升从业人员素养,促进家政服务就业等方面发力,提升行业职业化、规范化水平。

《措施》创新推出“项目制培训补贴”模式,获培训合格证书者,每人每学期补贴不超过25元,最高80学时;参训人员取得家政类相关职业资格证书并在半年内就业的,按每人300元~600元补贴培训单位。同时,今年将建设10家以上家政、养老护理龙头企业实训基地,每个设区市至少建设1家,并予以补贴。

为缓解家政行业人才短缺问题,福建大力推进完善就业服务。福建将依托目前已上线的24个零工平台(小程序),已建成的727家线下市场(站点),推进“网约式”零工平台在家政领域的运用,为灵活就业群体提供优质的公共就业服务。

针对当前大量家政从业人员没有工伤保险的问题,《措施》明确,支持通过开发特色商业保险产品,给予商业保险补贴,以及推广“益盛保”“零工保”等方式,保障家政企业和从业人员权益。为推动家政企业向员工制转型,福建将引导家政企业建立与技能匹配的分层级薪酬分配办法,推行居家上门服务证管理等,让从业者“劳有所得、技有所值、行有所证”。

四川支持大龄领取失业保险人员参加养老保险

本报讯(记者李娜)近日,四川省明确全省失业保险基金为大龄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缴纳养老保险费的政策,以及政策对象、支付标准、经办流程等。

据悉,四川相关政策明确,大龄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是指在四川省领取失业保险金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1年的失业人员。大龄领金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以个人身份自行参加四川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缴费至法定退休年龄。

其中,由失业保险基金承担的大龄领金人员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按照四川省灵活就业人员最低缴费标准缴纳的养老保险费部分确定,也就是缴费当年全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乘以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缴费比例。

由失业保险基金承担的养老保险费,按照“先缴后补”原则办理。大龄领金人员开始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后,可凭本人有效身份证或社保卡,向领金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一次性申领由失业保险基金承担的费用。

四川省人社厅有关负责人表示,支持大龄领金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是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的重要保障措施。各地将优化经办流程,畅通申领渠道,为大龄领金人员提供高效、便捷服务。

宁夏社保监管迎来“数字安全员”

本报讯(记者马学孔 李静楠)记者近日从宁夏回族自治区人社厅获悉,宁夏在社会保险经办领域持续升级数字化监管手段,启用了328个“数字安全员”,以进一步保障社保基金的安全,推动社保经办管理向智能化、高效化的新时代迈进。

据悉,宁夏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通过自主设计开发稽核风控业务模块,已全面嵌入疑似死亡冒领等62条高风险业务经办稽核规则。目前,仍在新增修订批量办理未达龄退休等27条稽核规则。自该模块上线以来,已筛查疑点数据近万条。

此外,宁夏通过嵌入328条涵盖参保登记、待遇核定等关键环节、高风险业务事中管控规则,构建了风险实时拦截、业务自动核验的智能化管控新模式。这328个“数字安全员”通过扫描生产库数据流,能够对触发规则引擎的操作进行实时风险拦截。自2024年下半年规则嵌入以来,系统已阻断触发高风险业务51次,预警提示中低风险1.2万余次。

截至目前,宁夏社保经办已实现四级全程监控。宁夏社保经办管理通过智能化管控,不仅能够迅速定位经办过程中的问题,减少人工审核耗时且易遗漏的情况,还能对触发管控规则的风险进行预警拦截,有效降低了社保基金损失的风险。

贵州建立就业影响评估工作机制

本报讯(记者李丰)记者近日从贵州省人社厅获悉,贵州将建立就业影响评估工作机制,开展政策影响评估,将是否对就业产生不利影响作为重点内容。同时,实施项目影响评估,充分发挥就业带动作用,积极支持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产业、企业和项目。

贵州明确,要坚持就业优先目标,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时,把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优先目标。要促进国有企业稳岗,防止区域性、行业性失业风险。

此外,贵州还要求,要通过产业招商扩大就业,注重引进产业链条完整、能够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支持重点群体创办经营主体。

中医日间诊疗服务惠民生

近日,在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中医院日间诊疗中心,医护人员在为患者艾灸。近年来,淄博市试点推出中医日间诊疗服务,打造“随治疗、随回家”的新型住院模式。患者入院后,床位费、护理费按现行收费标准的30%执行,切实减轻患者就医压力。 新华社记者 朱峥 摄



浙江宁波探索建立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调解中心,创新线上线下融合调解——

劳动者在出租车上就完成线上调解

本报记者 窦菲涛 本报通讯员 陆桑楠

随着平台经济的发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规模不断扩大,相关的劳动纠纷也日益增多。特别是因为用工主体界定难、关键证据举证难,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维权存在一定困难,影响其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为此,浙江省宁波市探索建立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调解中心,拓展线上调解渠道,创新多元联合调解工作新模式,实现劳动纠纷早发现、早化解。

试点建立一站式调解中心

快递员林先生入职某快递驿站后,因丢件、破件被扣高额赔偿,辛苦干了一个月,不仅拿不到工资,还倒欠公司不少钱。为此,林先生向宁波市鄞州区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调解中心申请调解。

在调解员的多次联系和敦促下,快递驿站负责人终于来到调解室,和林先生核对了派件费用、签下调解协议,并通过就近的仲裁派出庭对协议进行了仲裁审查确认。林先生如愿拿到了劳动报酬。

记者了解到,鄞州区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

一站式调解中心成立于2023年5月,是浙江首家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调解工作室。该调解中心由仲裁员、法官、律师、行业专家等人员组成联合调解专家团队,通过派驻、轮驻、联合调解、集体研讨等方式,每周4次为劳动者和平台企业开设“专家门诊”。

同时,该中心注重靠前防范,定期走访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集中的企业,开展用工指导,编写新就业形态劳动权益保护“百宝书”,深入招聘会现场提供咨询解答,从源头减少劳动纠纷的产生。据悉,该调解中心运行以来,累计调处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207起。

而在宁波市海曙区,该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集中的合一生活园区为试点,成立一站式调解中心,服务周边100多家企业的近千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线上调处便利用工双方

“我同意这个调解方案。”在鄞州区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调解中心的大屏幕上,传来某平台公司负责人的声音。屏幕前坐着的是本次调解的申请人外卖配送员陈某和调解员叶旭东。“请当事人签名对调解笔录予以确认。”随着叶旭东的提醒,双方对调解结果予以认可。这也意味着这起纠纷线上调解

顺利完成。

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熟悉网络操作的特点,该调解中心打造线上调解渠道。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以来,鄞州区近九成的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系通过线上处理。

而这背后,离不开宁波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推广的“数字仲裁庭”。

在另一起网络主播与传媒公司之间的劳动争议仲裁中,申请人表示开庭当日需要出差,无法到庭。经双方同意后,仲裁员在开庭当日指导当事人进入“数字仲裁庭”,组织双方举证、质证。查清事实后,仲裁员耐心地调解,促成双方达成调解意向。最终,申请人在出租车上就完成了线上开庭和调解。

依托浙江省智慧仲裁平台,宁波打造了13家“数字仲裁庭”,覆盖全市,实现劳动者庭审调解、证据交换等全流程网上办理。2024年,宁波两级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网络办案率55.52%,案件审理时间平均降低50%。

多元联合调解化解纠纷

姚先生与A公司订立自由职业者协议后,被派往E平台下的外卖站点从事骑手工作,劳动报酬由B公司以“劳务费”的名义发放。随后,姚先生在劳动报酬结算上与三家